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
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

號：1304

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版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行者：新 華 書 店

刷者：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阜成門外北藍土廠)

0,000
,700元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出版者說明

本書是根據『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所附錄的原文重印。書中的註釋，均採自『毛澤東選集』。有些註釋在文字方面，按照單行本的需要，曾經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作了一些修改。

一九五三年三月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我們黨一成立，就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在爲實現新民主主義而進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奮鬥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三個歷史時期中，我們黨始終一貫地領導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向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於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爲主要羣衆、以反帝反封建爲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衆、情況極複雜、鬥

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由於堅持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並向一切與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了勝利的鬥爭，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達到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鞏固和統一，發展爲今天這樣強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餘萬黨員，領導了擁有一萬萬人民、近一百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爲全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重心。

(二)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全體同志，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進並幫助了國民黨的

改組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幹，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門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於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特別是由於在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爲投降主義路綫，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於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

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的十年間，中國共產黨，並且只有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的統治下，全黨團結一致地繼續高舉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羣衆，作了政治上、軍事上和思想上的偉大戰鬥。在這個戰鬥中，中國共產黨創造了紅軍，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分配了土地給貧苦的農民，抗擊了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進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

略，使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全黨對於企圖分裂黨和實行叛黨的托洛茨基、陳獨秀〔一〕派和羅章龍〔二〕、張國燾〔三〕等的反革命行爲，也同樣團結一致地進行了鬥爭，使黨保證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總原則下的統一。在這十年內，黨的這個總方針和爲實行這個總方針的英勇奮鬥，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無數黨員、無數人民和很多黨外革命家，當時在各個戰綫上轟轟烈烈地進行革命鬥爭，他們的奮鬥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後繼的精神和功績，在民族的歷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沒有這一切，則抗日戰爭即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亦將因爲沒有一個積蓄了人民戰爭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作爲骨幹，而不能堅持和取得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

尤其值得我們慶幸的是，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於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十年內有了很大的發展。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這十年內，我黨不僅有了偉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時期

中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從黨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六屆四中全會）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爲嚴重。這個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的損失。

爲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爲『後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爲着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爲：對於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二)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在黨內曾經發生了『左』右傾的偏向。

以陳獨秀爲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於革命前

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採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爲一九二七年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於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佔優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他們武斷地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爲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鬥爭，並污蔑當時的紅軍運動爲所謂『流氓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因而不得不得驅逐出黨，接着並墮落爲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黨內，使黨內的『左』傾情緒也很快地發展起來了。這種『左』傾情緒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已經開端。『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

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羣衆繼續革命的戰鬥，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却爲『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過分地或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幹部的單純的工人成份的意義，並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後繼續生長，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爲『左』傾的冒險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並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的冒險主義者認爲：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顧敵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後的羣衆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羣衆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和這種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同時，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打擊政策也發展了起來。但是由於這個錯

誤路綫一開始就引起了毛澤東同志和在白色區域工作的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非難，並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這個『左』傾路綫的執行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傾路綫的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全國範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間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綫，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出了引起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因此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發佈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五〕}。它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指出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羣衆。它進行了兩條戰綫的鬥爭，批判了右的陳獨秀主義和『左』的盲動主義，特別指出了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羣衆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會也有其缺點和錯誤。它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對於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

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這些缺點和錯誤，雖然使得『八七會議』以來的『左』傾思想未能根本肅清，並被後來的『左』傾思想所片面發展和極端擴大，但仍然不足以掩蓋第六次大會的主要方面的正確性。黨在這次大會以後一個時期內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時期內，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第六次大會路線的正確方面，並正確地解決了許多爲這次大會所不曾解決或不曾正確地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具體地和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根據。在他的指導和影響之下，紅軍運動已經逐漸發展成爲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黨在白色區域的組織和工作，也有了相當的恢復。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間，還在黨內存在着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又有了某些發展。在這個基礎上，遇着時局的對革命有利的變動，便發展成爲第二次的『左』傾路線。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蔣馮閻戰爭爆發後的國內形勢的刺激下，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產生這次錯誤路線（李立三路線）的原因，是由於

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認爲「羣衆只要大幹，不要小幹」，因而認爲當時不斷的軍閥戰爭，加上紅軍運動的初步發展和白區工作的初步恢復，就已經是具備了可以在全國『大幹』（武裝起義）的條件；由於他們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爲革命危機在全國各地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並污蔑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來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由於他們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爲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中才能成功；由於他們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爲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並因此規定了若干不適時宜的『左』傾政策。在這些錯誤認識下，立三路綫的領導者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後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爲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於停頓。在這些錯誤決定的形成和執行過程中，立

三同志拒絕了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建議，並在黨內強調地反對所謂「右傾」，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黨內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幹部，因而又發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這樣，立三路綫的形態，就比第一次「左」傾路綫更爲完備。

但是立三路綫在黨內的統治時間也很短（不到四個月時間）。因爲凡實行立三路綫的地方都使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廣大的幹部和黨員都要求糾正這一路綫。特別是毛澤東同志，他不但始終沒有贊成立三路綫，而且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這個時期內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馮閻戰爭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展，並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除個別地區外，也得到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在白區，也有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經過黨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綫。

一九三〇年九月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對於立三路綫的停止執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雖然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還表現了對立三路綫調和妥協的精神（如否認它是路綫錯誤，說它只是「策略上的

錯誤」等），雖然六屆三中全會在組織上還繼續着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六屆三中全會既然糾正了立三路綫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因而它就結束了作爲立三路綫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屆三中全會上也承認了被指出的錯誤，接着就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地位。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補充決議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號通告中，進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綫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當然，無論六屆三中全會或其後的中央，對於立三路綫的思想實質，都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一直存在於黨內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六屆三中全會上和六屆三中全會後還是濃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既然對於停止立三路綫作了上述有積極作用的措施，當時全黨同志就應該在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以求反「左」傾錯誤的貫徹。

但在這時，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在陳紹禹（王明）同志的領導之下，却又在「反對立三路綫」、「反對調和路綫」

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綫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了。他們的鬥爭，並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澈底清算立三路綫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着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陳紹禹同志的『兩條路綫』即『爲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勢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綫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爲新的『左』傾路綫。

陳紹禹同志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綫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綫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綫的『右』，是它指責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綫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綫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的問題上，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誇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鬥爭、反富農鬥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份』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